

上海与巴黎:两座城市的对话

——评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
——以左拉和茅盾为例》

王 红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36)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7)03-0185-4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都市及都市文学研究的热潮,对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对城市的想象等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把“城市”作为影响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文学的背景及主题纳入文学研究的视界,甚至纳入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但中国本土近 20 年的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研究范围,几乎局限于中国文学自身,在一段时期内甚至主要是以上海文学为焦点。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以下简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对中法现代化、都市化发达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对照研究的专著。虽然上海与巴黎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也联系密切,法国的现代化、都市化影响过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这已经为历史研究所证实。正如作者所说,上海这个被强行拉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城市,在它崛起和走向大都市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体现了某些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特点,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在上海无法避免。而上海,作为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的城市,又与西方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面临着自己特有的问题。巴黎是上海的榜样,上海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巴黎”,上海也以此自居、自豪。“东方巴黎”的称谓不仅标示了它的国际意义,也表明中国

人或西方人是按照西方的流行想象把上海和欧美的都市联系了起来。处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但又存在着“历史类型”上的相似的城市,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它的再现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作家的价值观念、城市态度和城市想象及文学再现方面,也存在于中法作家对于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方面。

《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两个作家为个案,从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作家的城市体验和现代化态度,文学中的城市空间表现,市民社会、城市精神,城市的未来(救赎或革命)四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巴黎和上海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领域对于现代化、都市化的独特反应和再现形式。作者分别将左拉和茅盾置于各自国家知识分子的传统和都市化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身份、价值观念、都市态度及城市再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左拉追求精神自由和独立的超然气质、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来自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作者对左拉和茅盾的差异性作了这样的理解:“左拉是巴黎的大街之子,城市里的流浪者和孤独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文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这决定他体验城市的方式是纯粹个人化的。”“他介入政治的方式也是个人性的、超越于党派的。真理与正义作为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原则甚至超越于民族和国家之上。他以真实为最高原则的自然主义文学观与他追求真理的终极关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又成为他改造社会、批判社会、重建城市乌托邦的依据。”[1:222]茅盾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思想孕育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西方人文主义、个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共产主义和科学主义成为他反对儒家教条的武器,而“儒家思想中通过进入庙堂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实现士所追求的‘道统’、传统士大夫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等等都是茅盾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茅盾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和军阀割据的危机现实中表现得异常强烈。”[1:223]这使茅盾在社会岗位之外又具有极大的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热情,因此,他具有政治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强大的政治使命感

使茅盾如同许多作家那样,组织文学或政治社团乃至参加政治党派,表现出集体主义的团体合作精神。或者说茅盾对于文学的理解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由于左拉与茅盾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他们各自从民族传统和现代文化中汲取的思想资源不同,他们与各自城市的关系、在城市中的个体身份、生存境遇等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又使他们面对和关注的城市问题有所不同,即使是同样的问题,他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价值判断。在对于城市的表现中,空间是所有都市文学的必要元素,左拉小说在对巴黎的表现中关注的是巴黎的生态及空间的心理象征意义,迷宫意象与大都市化给人的心理造成的焦虑感,物理性的空间结构与小说叙述结构密切相关。而在茅盾的小说中,上海现代性的殖民特征决定了作家在对上海的空间表现中,主要以空间分割、华洋分居、杂居、异国情调的大街和建筑为主体,以租界代替上海。在茅盾的空间意识中,生态问题尚未引起关注,相反,机器、工厂是他赞美的对象,工厂、烟囱林立被看作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茅盾对于工业主义的赞扬,正好与左拉对于工业主义的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左拉从都市本体的角度、从人性的立场出发,对都市化中的欲望放纵以及道德沦丧和人的精神状态予以表现,而茅盾却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立场对都市问题做出评价。最后,在城市的出路和价值重建的问题上,左拉融合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思想,而茅盾却更多地诉诸暴力革命,表现出价值的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并存的特点。《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通过两个作家的比照分析,着重探讨了中、法两国作家对于各自国家现代化的理解、想象和评判以及传统价值和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正如作者所说:“通过本论题的研究和写作实践,试图就‘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上的探索。在研究观念上,把左拉与茅盾置于平等地位,使他们二者互为对照性的参照系,不仅从左拉这一‘他人之镜’的角度来观察茅盾,同时也从茅盾这一‘陌生的角度’观察左拉。”[1:22]《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在研究方法

上突破了以往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既定模式,不局限于两个国家、两个城市和两个作家相互影响与接受的事实考据和就相同或相似问题进行一一对应的异同比较研究,而是结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使两个研究对象互为参照,采用对照研究的方法,以城市为共同主题,分别对左拉和茅盾从作家主体到作品再现予以整体把握,两种文化、两个作家的差异和相似、平行与交叉不言自明。

本书对于中国都市文学研究的贡献在于,引进西方都市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强调“文学中的城市”、“语词的城市”和想象、再现、表述、话语对现实城市的塑形以及在文学中城市被“观念化”的形态,摆脱了城市文学研究对于城市文化研究的附庸地位,强调文学对于都市的想象与再现,文学城市对于现实城市的再“建造”。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建造’了语词的特洛伊城,才使现代的考古学家寻访并发现了历史上的特洛伊。‘文学中的城市’,参与现在和未来人类对其生存空间——城市——的认识、想象和再讲述,并参与实在的城市规划和建造。文本中的城市与其说是实体的城市,毋宁说是人类对城市的表述,揭示了人类关于城市——关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关于自己的创造物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超出了人的生理和心理边界,人通过感知和体验把握的,只是城市的碎片和局部,只有通过地图、语言、图象、符号认识城市。正是通过语言和符号的表述,城市被“秩序化”,城市的形象变得清晰,成为可认知的对象。另一方面,“城市中的文学”的研究倾向也超越了“城市/都市文学”概念和范围的人为划定对文学研究的限制,将以往被排除于城市文学研究的左翼作家作为研究主体,并对文学中的城市元素进行研究,对作家的城市体验、城市态度、先在的城市知识以及具体创作中的城市意象、主题、空间、市民、城市精神及价值等进行细致分析。

参考文献:

- [1]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